哲人永在

罗　明

在清史所建所三十周年之际，我们深切怀念清史所的奠基者郭影秋校长和首任所长罗髫渔。

清史所的建立以及建所初期之所以能够顺利发展，和郭校长的关怀和指导是分不开的。自1965年10月中宣部部务会议确定清史编委会人选（郭影秋、关山复、尹达、刘大年、刘导生、佟冬、戴逸），决定清史研究机构设在人民大学，郭校长就时刻关心纂修清史的事，不断和有关同志，如社科院历史所的尹达同志等交换清史纂修工作的意见。1972年人大停办，是他向上级机关建议成立清史研究小组，成建制挂靠北师大，以利于保存有生力量，一旦时机成熟，即可开展工作。事实证明，这是一个有远见卓识的建议，1978年人大复校，教育部批准成立清史研究所时，转轨工作比较顺利，因为清史研究小组机构健全，队伍保持完整，而且已经在当时可能的情况下，进行了研究工作和规划工作，取得了一些初步的成果。8月建所，当月即决定招收第一届研究生，比同时建立的历史系先走一步，就因为清史所有较好的基础条件。

郭校长对清史所建所之初的干部配备极为关心，罗髫渔同志任所长，戴逸同志任副所长主持工作（80年改组即由戴逸同志任所长），调赵侃同志任书记（赵后调校图书馆任馆长），这样的安排，适合当时的实际情况。对清史所一段时间内的研究方向，具体到研究课题，郭校长都提出了指导意见，《简明清史》和《清史编年》两个项目，就是郭校长提出的。

人大复校后，在“文革”中遭受残酷迫害的郭校长，常在医院病床上约见当时研究所的领导和研究人员，了解情况，指导工作，1980年以后，他转到上海瑞金医院治疗，虽不在北京，仍随时关心清史所的工作。1981年中国历史大辞典编委会在上海开会，与会期间，我曾去医院探望过两三次，那几年我经常出差上海，只要有机会一定会到瑞金二路去。郭校长学识渊博，记忆力惊人，对历史有许多精辟见解，我深感学识浅薄，思虑粗疏，愧对长者，每次见他，都是一次学习的好机会。他对清史所的工作进展非常关注，尤其关心人才培养。他是明清史专家，对当前的队伍状况、研究状况都很清楚，他认为纂修清史靠目前队伍很难完成，须着力培养研究生，对78级研究生教育情况询问得非常详细，具体到每一个人的状况，他都很关心。79级研究生赴上海学习考察，他在接见他们时，说话语重心长，勉励有加，充分体现了他对事业后继者的殷切期望。

郭校长响应中央关于老同志写回忆录的号召，原先已动手写了一些，后因病无法进行下去，经所里研究，戴逸同志决定派王俊义同志去上海协助郭校长工作。郭校长在两个多月的时间里口述录音带近五十盘（每盘一小时），大约每天得讲至少两个小时。他当时病已很重，说话时会突然皱眉头，吸凉气，那是在强忍疼痛，如果没有坚强的毅力，怕是很难坚持的。王俊义同志把录音翻写成文字时，又参阅了郭校长多年积累的日记和往来书信，以及有关的党史资料，对所提到的人、时、地、事进行核对，无资料可查核的，就访问有关的老同志。口头讲述和书面语有一定差距，差不多是一次再创造。王俊义同志的辛勤劳动，终于使郭校长的回忆录得以完成。这本回忆录后定名《往事漫忆》，1986年由人大出版社出版，那已是郭校长辞世以后的事。郭校长一首诗中有“学剑不成书误了，脱胎未净神难肖”之句。他一生严于律己，我想这既是自谦之词，也有自我督责之意，郭校长一生功业，书剑俱臻上乘，已是举世公认的。

在怀念郭校长时，我不免又想到清史所首任所长、革命老前辈罗髫渔同志。对这两位前辈，

我一向怀有崇敬之情，因为他们为国家的富强、为民族的复兴、为人民的幸福奋斗终身，他们的高贵品质，永远值得后辈学习。

罗髫渔同志是1926年入党的老同志，曾任黄埔军校政治教官，1927年参加北伐，南昌起义后任十一军政治部主任（军长叶挺、党代表聂荣臻），起义失败后从潮汕坐小木船浮海去香港，后转赴上海做地下工作，1931年被捕入狱，受尽非刑，抗战爆发后，任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（厅长郭沫若）的图书室主任（校级军衔）。武汉撤退时，他负责指挥三厅人员和物资的撤退工作，经过艰苦的行军，经湖南、贵州至重庆。此事郭老在《洪波曲》中曾有记述。解放战争时期，在国共谈判破裂，当时的四川省委书记吴玉章等撤退后，组建四川临时工委，任书记（似因当时通讯困难，未与中央建立联系）。不管中央是否认可，他当时在四川的领导工作却是确实的，四川解放后，任四川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（副校长），后调中央任中苏友协副秘书长。最后到人民大学任语文系主任，《教学与研究》总编。1978—1983年任全国政协委员。以上简历，只是我平时耳闻及办理罗老丧事时看到的一些简要材料，在这些经历的背后，肯定蕴藏着极为丰富的内容，一个老共产党员一生奋斗的历程，九死一生，刀光剑影，斗勇斗智，忠贞不屈，是可感天地而泣鬼神。清史研究所所长，是这位老前辈一生中最后的一个岗位。

罗老既是曾经驰骋沙场的战士，也是一位博学多才的学者，他的著作《世界文化史讲话》，解放前曾重版八次之多，解放后还出过第九版，他通晓外文，曾翻译过《世界近代史》、《德国近代史》、《国际工人运动》，他译著均用笔名，故知者不多，罗老国学功底深厚，擅长古典诗词，还写得一手好字，最早挂在张自忠路3号大门的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牌子，就是罗老的手笔。

罗老淡泊名利，生活俭朴，慈祥谦和，后生辈对他都很敬重。他出任所长时年事已高，许多具体的事很少麻烦他。但他在长期革命斗争中锻炼而成的品德和情操，是一种无形的精神力量，激发人们努力向上。建所初期，全所同志，紧密团结，努力工作，这和罗老的这种感召力有密切关系。

中央号召老同志写回忆录，组织上希望罗老能把他一生的经历写下来留给后人，他的回忆录肯定会为党史留下一篇宝贵资料，为世间立一人生典范，是一件极有意义的事。经所里研究，戴逸同志决定由王俊义、曾黎力、孔祥吉三人协助罗老工作。这三位都是高手，只要罗老能提供基本的线索，就一定能够圆满完成。我们都知道罗老已有记忆力衰退的迹象，但没有想到其衰退的严重程度竟出乎预料，谈了几次，实在进行不下去，只好作罢。至今思之，仍令人叹息不已。

在纪念建所三十周年之际，可以告慰郭校长和罗老的是，他们期盼的清史纂修工作，已由中央批准启动，现正在戴逸同志领导下，集全国之力加紧进行，杀青有期。

饮水不忘掘井人，清史所应该永远记住郭校长和罗髫渔同志。